

国内外教育参考

2010年第2期

主办：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010年4月20日

本期目录

● 最新动态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收到意见建议近3万条.....	1
温家宝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
袁贵仁：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3

● 国际观察

教育部：2009年来华留学生突破23万 创四项新高.....	5
俞书宏获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会评论》新科学家奖.....	6
本科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留名 科学家需要博士帽吗？.....	7

● 专家论教

专家：高校去行政化 改变资源分配方式是关键.....	11
----------------------------	----

● 经验借鉴

美、英、日大学—政府—企业合作模式对比与分析.....	12
合作打造法国教育“品牌”——《菲利普报告》解读.....	18

● 最新动态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收到意见建议近3万条

北京3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表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文本自2010年2月28日至3月28日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征求意见工作顺利结束。

截至3月28日24时,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共收到意见建议27855条,其中电子邮件8317封,信函1064封,教育部门户网站网友发帖18474条。此外,从媒体和网络收集的报道评论与意见建议249万多条。

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吴德刚说,制定规划纲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深入大中小学调研。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规划纲要》领导小组组长,先后发表两篇重要文章,多次主持召开相关座谈会并指出,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在工作小组组长刘延东国务委员直接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通过第一轮征求意见,纲要制定者也了解到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高考改革问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问题等。

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升学考试的办法”,让进城务工人员江雨山激动不已。他在教育部门户网站上发帖说:孩子受教育刻不容缓,希望这项政策“说到做到”“尽快落到实处”。

看到公开征求意见稿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提出很多改革措施,湖北省黄冈市人大研究室工作人员黄新国在表示肯定意见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将“就近入学”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原则予以明确。

在教育部集纳整理的一份各界人士来信来函来帖选编中,有的人为教育发展“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鼓掌”,有的人为改革措施是否能落到实处“表示担忧”;有教师为提高自身待遇提出许多具体设想,也有家长为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振臂高呼。

在这些来信来函中,有不少关于教育深层次改革的思考,与纲要制定者产生了广泛的互动。如,针对人才培养问题,一位名叫闫树权的人在教育部网站发帖指出: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能否编辑一套与学校教育相配套的家长教材,使家长了解并支持学校实施的素质教育,与学生同步成长。

河南焦作一位名叫孙连艇的群众在建议中这样写道:全民一定要用战略眼光看待教育,必须树立大教育观念,让全民知道教育不光是教育部门、学校和专业人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责任和任务。

目前,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正在对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并积极吸收到修改后的纲要文本中。

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纲要的制定过程体现了“教育振兴,全民有责”的时代主题,昭示着中国教育改革的又一个崭新起点。

“公众的参与是支持教育发展的巨大的社会资本,”吴德刚说,“我们坚信广开言路对于科学决策有百益而无一害。真理会越辩越明,即使有些意见暂时没被采纳,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¹

温家宝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北京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4月15日上午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延东、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但教育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新形势的更高要求。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提升国民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深远意义。

¹ 中国教育新闻网-国内教育(2010年3月29日)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003/t20100329_349924.html

会议指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纲要》制定工作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教育发展的成就和经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把握新时期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努力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发展水平和城乡差别大、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坚持突出改革创新，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在改革创新中促进教育发展。

会议指出，《纲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确定了到 2020 年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把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按照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终身教育体系的要求，明确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 6 大发展任务，同时还部署了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发展任务。以创新人才培养体制为核心，对教育改革进行了系统设计。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高考改革、落实扩大办学自主权、教师队伍建设和政府投入责任等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有力可行的措施。《纲要》既系统设计、谋划长远，又突出重点、部署近期任务；既注重在理念和思路上进行阐述，又提出一些扎扎实实的政策举措；既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又对全社会提出了要求，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会议充分肯定制定《纲要》采取问计于民、开放式的有益经验。《纲要》制定经过了调查研究、起草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三个阶段，组织各地、有关部门、学校、社会团体等广泛参与，两次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动员人力之多、覆盖范围之广、社会参与度之高在我国制定规划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达到了广聚民意民智、凝聚共识的目的。

会议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意见，决定了下一步工作。路甬祥、陈奎元、徐匡迪和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²

袁贵仁：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教育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还是要看是不是真正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教育需求。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教育需求是什么？主要是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为多样教育的需求。一是随着知识、技能的价值越来越充分显现，教育对改变个人命运、创造幸福生活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二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三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的日益丰富，人民群众对多样化、个性化教育的需求从来

² 中国教育新闻网-国内教育（2010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004/t20100415_353622.html

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在新形势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遵循教育规律是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在当前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切实尊重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地将中央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尊重教育规律统一起来。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改革发展必须立足国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从基本国情出发，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要按照人成长成才的规律，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积极适应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是尊重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与其他活动相比，教育周期长、见效慢，我们的工作必须具有前瞻性、预见性，超前部署。同时，教育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我们的工作必须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必须加强统筹协调。

二是尊重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教育工作的对象是人，尤其是充满生机活力、具有远大理想追求、富有个性化发展潜质的青少年。我们的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全面发展、人人成才的观念，终身学习、系统培养的观念，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努力改变单纯以升学率、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衡量发展成效和工作成绩的观念和做法，努力改变简单以学历文凭衡量人才质量和水平的观念和做法。

三是尊重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教书育人是一项专业性、探索性、创造性极强的工作，要求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具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心，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来不得半点三心二意，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我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改善教师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为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另一方面要努力改进教师管理制度，严格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使每位教师都能够成为爱岗敬业的模范、教书育人的模范、终身学习的模范，成为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力图体现中央精神、人民期盼、教育规律。今年，教育工作要在思路和重点上努力体现规划纲要精神，启动实施规划纲要。我们要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的组织实施，真正办成办好几件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教育发展增添动力的好事实事。³

³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3月7日（作者为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 国际观察

教育部: 2009 年来华留学生突破 23 万 创四项新高

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在中央统一部署下,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来华留学工作, 坚持“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原则, 逐步完善来华留学工作体系, 2009 年, 全年在华学习人数首次突破 23 万人。

2009 年, 共有来自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8, 184 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 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 610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我国接受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

与 2008 年相比, 2009 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增加 14, 685 名, 同比增长 6. 57%。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增加 4, 729 名, 达到 18, 245 名, 同比增长 34. 99%, 增幅显著; 自费生增加了 9, 956 名, 达到 219, 939 名, 同比增长 4. 74%。

按洲别统计, 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人数占首位, 计 161, 605 名, 占全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67. 84%; 欧洲为 35, 876 名, 占 15. 06%; 美洲为 25, 557 名, 占 10. 73%; 非洲为 12, 436 名, 占 5. 22%; 大洋洲为 2, 710 名, 占 1. 14%。

按国别统计, 来华留学生人数名列前 10 位的国家是韩国 64, 232 名, 美国 18, 650 名, 日本 15, 409 名, 越南 12, 247 名, 泰国 11, 379 名, 俄罗斯 10, 596 名, 印度 8, 468 名, 印度尼西亚 7, 926 名, 哈萨克斯坦 6, 497 名, 巴基斯坦 5, 738 名。此外, 来华留学生数量超过 4000 名的国家还有蒙古 5, 684 名, 法国 5, 422 名, 蒙古 4, 774 名, 德国 4, 239 名。

按留学生类别统计, 学历生 93, 450 名, 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39. 23%, 同比增长 16. 81%, 远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增长速度, 其中本科生 74472 人, 硕士研究生 14, 227 人, 博士研究生 4, 751 人; 非学历生 144, 734 名, 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60. 77%, 同比有所增长。

建国 60 年来, 我国共累计接受来华留学人员 169 万人次。2010 年 2 月 28 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 在体制改革部分对来华留学有如下表述: “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 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 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 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 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在保证措施中提到要“实施留学中国计划, 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在留学中国计划启动后, 我国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将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 推动来华留学工作快速发展, 同时注重规范管理, 保证质量, 争取到 2020 年全国当年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 50 万, 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⁴

4 中国新闻网 (2010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zcdt/news/2010/03-22/2183667.shtml>

俞书宏获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会评论》新科学家奖

Chem Soc Rev

The home of high impact reviews from across the chemical sciences.



Chem Soc Rev Award winners announced

24 March 2010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Professor Gerard Parkin and Professor Shu-Hong Yu have won the 2010 *Chem Soc Rev* Lecture Award and Emerging Investigator Award respectively.



Professor Y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was recogni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materials science, in particular the self-assembly of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I am very pleased to be selected for this prestigious award from Chem Soc Rev, which will encourage me to move forwar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

- Shu-Hong Yu

3月18日，国际著名期刊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会评论》(Chem Soc Rev)主编Robert Eagling博士宣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该刊编委会会议上，决定将2010年度“《化学会评论》新科学家奖”(2010 Chem Soc Rev Emerging Investigator Award)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以表彰他近年来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后对材料科学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他在自组装纳米结构材料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该刊近日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公布了该奖获得者名单。

该奖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会评论》设立于2008年，每年由该刊国际编委会从全球范围内遴选一位在独立从事化学或相关学科领域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优秀科学家，旨在表彰其在早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中对所在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此前，2008年度、2009年度“Chem Soc Rev Emerging Investigator Award”分别由日本大阪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青年化学家获得，俞书宏教授是该奖项的第三位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他将应邀出席颁奖仪式并在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还将受邀为《化学会评论》撰写指南性综述论文。

近年来，俞书宏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人才计划的支持下，回国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仿生与纳米化学实验室”，所领导的课题组在模拟生物矿化与仿生材料、无机合成与制备、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生物质转化制备新型碳纳米材料及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在Nature Materials, Angew. Chem. Int. Ed., J. Am. Chem. Soc.,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Small, Chem. Mater., Chem. Commun., Chem. Eur. J.等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SCI检索论文202篇，受邀在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Top. Curr. Chem., J. Mater. Chem., MRS. Bull.等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综述和特征论文十篇。目前正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基金、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伙伴小组计划等。⁵

本科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留名 科学家需要博士帽吗？



谢寅龙（左）和李俊桦以及他们作为署名作者发表在《自然》的封面文章

科学家需要博士帽吗？

2009年的“五四青年节”，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校长李元元意外地收到一封“请战书”。11名该校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大）共同培养的在读本科生在信中立誓，“半年至1年时间内，要发表1-3篇《自然》或《科学》级别的学术论文”，且“其中至少一篇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听起来有点儿痴人说梦。就拿学软件工程出身的大三学生李俊桦、谢寅龙来说，当他们在请战书上签名时，有关生物遗传学知识水平“还停留在高中阶段”。

⁵ 科学网（2010年3月30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3/230233.shtm>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期刊数据库(RSC Online Journals)

<http://www.rsc.org/Publishing/Journals/cs/News/2010/award-winners-2010.asp>

让人意想不到的，2010年3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以一篇《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的构建工作》作为主刊封面文章。在这篇文章的54位署名作者中，李俊桦和谢寅龙分别排在第12位和第20位。至此，上述11名本科生中，已有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3篇学术论文。其中年仅20岁的本科生罗锐邦去年12月就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论文。

“我们在创造历史。”就像请战书中所预言的那样，对中国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来说，这无疑是场革命。

年轻人反而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在中国，许多科研工作者终其一生也未能在《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上留名，因此很多人都爱问同一个问题，“你们这些本科没毕业的学生为什么能做到？”

对此，当事人总是反问，“为什么不能？”

写请战书的11人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基因组科学创新班”（以下简称创新班）的首批学生。这个以培养基因组科学人才为宗旨的创新班成立于2009年3月，至今招了两届共25名学生。按照培养计划，学生们前5个学期在华工完成公共课和必修课，后3个学期到华大跟随项目课题，完成专业选修课和毕业论文等内容。

这实际上赋予了学生双重身份。“华大宿舍跟学校的宿舍长得差不多，4个人一间，上面是床，下面是书桌。”谢寅龙说。这时他们还像大学生那样玩电脑游戏和进行户外运动。但当他们走进写字楼，埋首在格子间里，与那些博士一起工作时，所承担的任务已经与正式员工相差无几了。

据说，《自然》杂志的编辑曾多次探访这座位于深圳的“基因测序工厂”。当他看到那些奔忙的本科生之后大为惊讶，并用科研学生工(Student-worker)一词来描述这个现象。

李俊桦就是其中之一。最近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他的主要贡献是验证新旧测序技术在测序上的一致性。而谢寅龙主要负责基因注释工作。

据说，这些研究不仅将对人类自身健康与体内微生物的微妙关系作出科学的诠释，也有助于预防和干预由肠道菌群引发的肥胖、肠炎和糖尿病等疾病。

“搞清楚之后，我就可以去卖减肥药了。”李俊桦笑着说。这是在解释了一连串专业术语之后，这位“80后”学生唯一一次“不专业的表述”。

不过，一年前刚来华大的时候，他可一点儿都不专业：除了高中生物课的有限积累，有关生物遗传学和基因测序的知识都是现学的。

这种“从无到有”的自学方式听起来匪夷所思。李俊桦说，通常在接到任务之后，他总是通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资料来获得基础知识。不懂的地方则去询问华大各领域的“牛人”，有时候甚至直接发邮件给文献的通讯作者，向海外专家求教。具体到设计、实施环节就完全靠自己琢磨和尝试。

难道想象中异常艰深的生命科学研究没有一点儿门槛？

“这正是基因组科学独特的一面。”请战书的起草人金鑫指着电脑屏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去年12月他曾以署名作者身份在《自然》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论文。“你看我收集的文章，都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金鑫发现，人类基因组计划大规模实施也正是从这开始的。因此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家”，年轻人反而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现在一流的物理学家在做三流的物理学课题。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学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学课题。”金鑫套用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的话来诠释自己的看法。前一句是说“当下物理学中未被发现的新领域是有限的”，后半句则认定“100年前，当知识和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物理学家只要找准了目标和方向都会有所突破”。在金鑫看来，如今基因组科学也处于这种临界状态，只要方向选对，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会有所成就。

学术无起点

创新班学生的惊人表现，再次印证了华工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小宁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即“学术无起点”。作为创新班项目的首倡者和直接推动者，这一理念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已经践行了30年。

早在1977年考入医学院校时，王小宁就在琢磨萧伯纳的名言“读书使人迂腐”。他的理解是，知识越多越专业，对事物判断能力就越强。但因为固有的思维方式，也很容易对事物产生否定的判断，这样反倒不利于接受和创新。

“所谓‘无起点’，就是不管你原来学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你懂或不懂，就是从一个个问题的起点开始，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学习，尽可能把不知道的知识在短时间内积累起来。”王小宁说。

2004年，王小宁调入华工担任生科院院长。上任伊始，他就着手安排本科生早进实验室。他认为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倒过来的学习方法”更符合认知过程。他把这叫做“赤脚医生学医”。

“赤脚医生不是好医生，但他知道什么叫病，什么叫重病。所以他一进学校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他知道哪些知识对未来当医生有帮助。”2005年开始，王小宁在学院里发起“低年级暑期实践的活动”，要求低年级本科生利用暑期赴国内拔尖科研机构从事见习活动，为此他还设立了“万元重奖”。

第一年，一名叫张鸽的女生获得了1万元的科研资助经费奖励。没想到，由此引发了“张鸽效应”。老师们发现，很多学生围绕她形成了一个科研团队，而那些被重奖的学生也自发组织同学们去实践，去参加科研比赛。这一活动的短期效应也日渐体现出来，那些被重奖的学生在保研时大多被北大、清华、中科院这类拔尖机构提前录取。

诸如罗锐邦和金鑫等人都是当年得万元重奖的学生。王小宁还记得，那年他俩和一位女同学在台上竞争的场景。那位女同学暑假在香港中文大学实习，独立测定了茶叶的成分。当时罗锐邦还只是本科一年级学生。

一位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在台下默默地听完，对王小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此看来，我们很多本科生奇才被现有的教学模式湮没了。”

这也是为什么王小宁提出与华大联办创新班，很快就得到了校方大力支持。

科学家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

据说，华大历来不问出身。该院常务副院长王俊本科还没毕业就进入基因组研究领域，至今有 20 多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论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就有 10 篇。他提出的口号“*We are muscles, We have no brain* (我们有的是肌肉，我们没有大脑)”，更是被“华大人”看做是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活力的象征。华工在本科培养模式的尝试，也只有在华大的土壤中才能迅速开花结果。这家测序能力及基因组分析能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基因组中心，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

科学体系第一负责人李英睿，本科期间以旷课的方式，在华大工作了两年。仅仅 2008 年~2009 年两年时间，就发表了 1 篇《自然》，3 篇《自然》系列文章，1 篇《科学》，共 11 篇国际权威期刊论文，其中 4 篇为第一作者。后来，这位 1986 年出生的北大学生拿着《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向母校要学士文凭。

罗锐邦如今被认为是后起之秀。有一次，他酒喝多了，拉着常务副院长王俊说：“你是三重傻帽儿。你看，你有学士学位、你又拿了硕士学位、你还拿了博士学位。你看我，现在什么学位都没有。”

王俊不仅不以为忤，还以此为荣，觉得华大后继有人。《自然》杂志甚至也发表社论，题目就是《科学家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实际上，这个特殊的科研机构始终信奉“自古英雄出少年”，因为他们的前辈詹姆斯·沃森，就是在 25 岁时发现了 DNA 双螺旋结构。

在王小宁看来，创新班学生能取得初步成果是因为两家学术机构都秉持着超常规的教育理念。这种合作培养模式并不具有通适性，而是一种个性化教育，仅适合前沿新技术。比如干细胞、蛋白质结构研究，就完全可以让大学生做主力，发挥他们的奇思异想。而有些专业是技能型的，比如医学领域就不能让 4 年级学生直接去做手术。

实际上，一些科学家在接触了创新班学生之后，也曾向王小宁表达过担忧，认为在一些相关知识上，这些学生还比较欠缺。

据了解，华工和华大近日正在筹备一个规模更大的“创新学院”。

“人类基因组的革命，带给生命科学的趋向就是越来越高精尖的技术和大规模的数据。因此未来的医学就是数字医学，未来的生物就是数字生物。”王小宁说，过去科学家历时 15 年，耗资数十亿美元才绘出 1 个人的基因图谱。未来可能 1000 美元，几小时就能完成。让这位生科院院长忧心的是，“中国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为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作任何准备。”

如今，他希望通过建立创新学院继续“静悄悄地革命”，而本科生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产生创新班这样大的轰动效应，而是为迎面而来的数字化的科学时代，培养和贮备一批顶尖人才”。⁶

⁶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教育-高教新闻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edu.cn/gao_jiao-news-367/20100407/t20100407_463169.shtml

● 专家论教

专家：高校去行政化 改变资源分配方式是关键

学生参与不足制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学生参与不足，特别体现在学生缺乏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作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学生主体其自身利益保障不足。在中西方大学发展史上，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书院还是近代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都提倡并组织学生参与民主管理。德国大学内部的委员会制，强调学生的民主参与，学生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法国更是在立法层面保障学生参与大学民主管理的权力。我国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鼓励学生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支持学生参加学校民主管理”，然而这一规定在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中还难以实现。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支持学生组织的建立和完善，鼓励学生在参与学校管理的同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是未来我国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环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湘萍）

去行政化关键是改变资源分配方式

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对大学的管理方式，不转变管理方式，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没有太大意义。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政府按照等级对大学进行资源分配造成的，只要政府不改变按照级别对大学进行资源分配的方式，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会一直存在。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对大学进行管理，关键是资源分配不能再按照级别论资排辈。所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并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内容，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政府不改变资源分配方式，而仅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那么大学的发展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大学发展的状况。

去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转变大学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实行管理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的转变。进入学校的经费，大头应按预算直接分配到院系所，少部分按照固定比例分给机关部处。同时大规模压缩和精简行政机构，把现有行政机构中大量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充实到院系所为教师提供服务。为了使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能安心服务教授，应取消新增行政人员的事业编制。另外，把原来由行政机构负责的出台政策文件和分配资源等任务转交给由教授和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各种委员会，为了提高决策方案的质量，应聘任少量高素质的能从事工作研究的专业人员进入委员会或把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研究任务外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乔锦忠）

去行政化需要强有力的监督

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政府对大学“放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内部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均衡的问题。如果回顾一下我国大学自主权在“放”与“收”历程中的曲折反复，审视一下学校彰显学术权力的种种努力最终却成就了学术与

行政的“联姻”等一系列事实时，就会发现，以上诸多问题的产生核心都在于大学的运转没有确立起一套明确、清晰、合理、公开的规范。权力的运作往往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由此导致各种越轨、失范事件的发生。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是祛除大学运行过程中的人为性和随意性，革除各种无序和失范，重构一种大学运转“范式”。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清晰厘定国家对学校干预的边界，以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的权责边界，即实现法人化治理，它需要借助于国家法律和大学章程得以体现和保障；其二是明确而强有力的监督，监督既来自国家，政府，也来自社会各方，任何越轨、失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应有的惩戒。⁷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杜瑞军）

● 经验借鉴

美、英、日大学—政府—企业合作模式对比与分析

摘要：本文梳理了发达国家在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中的独具特色的模式，包括美国的企业孵化器、工业—大学合作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英国的联合教授席位、创业型大学、教育公司，日本的共同研究中心、委托研究和委托研究员。希望为我国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学—政府—企业，产学研，孵化器，创业型大学，委托研究

发达国家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开展的时间比我国要久，他们在合作模式上的探索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本文撷取美、英、日三国独具特色的合作形式加以介绍，以期对我国当下的实践有所启发。

一、美国模式

1. 企业孵化器

作为为新产品或小企业诞生与成长提供帮助的一种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模式的孵化器，其概念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而作为一种正式的实践模式开始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孵化器原指一种人工孵化和培养雏禽的设施设备，在这里是指：在向新企业提供便宜而富有灵活性的场地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性服务，为管理、技术、融资援助牵线搭桥，提供与其他专家和企业家的交流机会等，从而达到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的目的。企业孵化器模式发源于美国。曾是美国第

⁷ 新华网-新华教育（2010年3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03/23/content_13226363.htm

一批工业城市之一的纽约州特洛伊城，随着传统工业的衰退，城市经济发展急剧下降。位于该城的伦塞勒综合工学院，在斯坦福研究园和硅谷的启示下，试图通过建立高技术区来振兴经济，于70年代初推行了一项“培育箱计划”，扶植了一批基础力量薄弱的小型高技术公司，并取得了成功。1981年，在该学院附近开辟了1200公顷的土地，创建了伦塞勒技术园区，1982年，又将技术园易名为“工业创新中心”。此后，企业孵化器便在美国兴起，并蔓延到欧洲。截至2000年初，美国已在39个州建立了大约270多个企业孵化器。

在美国，企业孵化器主要有四类。第一类，由地方政府或非盈利组织主办，约占孵化器总数的51%。创办此类孵化器旨在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地区经济多样化发展，扩大税收来源。第二类，由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办。这类孵化器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增强在开发高技术产品中的竞争力，扩散科研成果以及使学校所在地区的研发活动生机勃勃而创建的，约占孵化器总数的18%，其中多为大学主创。第三类，由私人企业主办，约占全部的22%。这类孵化器一般由风险投资公司、种子基金投资公司主办，也有大企业和房地产商合办的，旨在开发商业性和工业性房产以待孕育增值。第四类，公私兼营型，由政府、非盈利机构和私人合股兴办，约占9%。此类孵化器的好处在于既可得到政府支持，也能得到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及经费资助。

企业孵化器的历史虽不长，但它在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提高了新办小企业的成活率。据美国企业孵化器协会一项研究统计表明，凡未经孵化器孵化的小企业，50%在创办的头五年内垮台，而经过孵化器孵化的小企业，80%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成功率极大提高。在企业孵化器诞生前的20年中，美国年平均新增9000家企业，在企业孵化器诞生之后的五年中，年平均新增7.4万家企业。

企业孵化器通过其提供的一条龙服务设施设备和企业管理咨询，克服了一些传统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研发的缺陷，在推动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高技术产业，培育创新能力型企业，造就企业家队伍，振兴繁荣区域社会、国家经济等方面获得了显著实效。

2. 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为了加强大学与企业间的合作，美国政府科学基金会(NSF)提出了三种策略：鼓励工业进行实验性的R&D活动；促进大学在工业界建立分支机构；倡导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经充分酝酿和尝试，1990年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IUCRC)正式实施。至2001年，全美已有55个合作研究中心，它们虽隶属于大学，但与企业有着密切联系，往往依据企业实际需要开展课题研究，而NSF负有指导之责。

IUCRC的资金来源于NSF、企业和大学这三方，其中，企业界的份额最大。IUCRC组织形式各异，三种主要形式是：单一有限伙伴关系，即一所大学与几个企业联合而成，占55~60%；多大学—多企业合作形式，占20~30%；分布式计划书方式，即IUCRC广泛与企业 and 大学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合作，约占10%。从发展来看，第二种形式比例在扩大，其目的在于增进大学和工业交互贯通作用，紧密强化大学工业伙伴协作关系。目前，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合作研究中心有MIT复合物加工研究中心、加州大学集成传感器研究中心、伦塞勒工学院计算机制图

研究中心、罗德岛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沃尔赛斯特工学院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等。

1984年, NSF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在大学里建立25个“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ERC)的计划, 该项计划于1985年正式实施, 截至2002年底已建成并运作了20多个。ERC的管理模式灵活多样, 在不同高校中, ERC的构成不同, 其与工业界的关系以及与学校的结合方式也不同, 但一般都设立由NSF代表、大学代表和企业公司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业研究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等多种委员会, 分头负责各项工作, 职责清楚, 能调动大学、政府和企业各方积极性。ERC的基本单位是课题组, 以大学教师为领导, 由博士后、研究生、大学生以及业界的科学家携手完成研究与教学的任务。

ERC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工业生产的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 同时, 着力培养工业生产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它以工业界面临的主要任务为动力, 所研究的课题都是大学与工业界双方共同感兴趣的, 其组织模式一般是以一所新大学的一个或几个有优势的系、专业为核心, 要求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参与。其经费最初由国家资助, 参与合作企业也给予相应资金, 但随着ERC运作步入正常, 国家资助逐年减少, 而企业资助则逐年增加, 最终靠参与双方共同研究、成果分享、双方受益的良性循环解决资金问题。目前, 美国比较有名的ERC包括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微电子机器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通信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系统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处理工程研究中心等。ERC卓有成效的创办经验, 有力地推动了大学、政府和合作企业的合作, 为此, 美国联邦政府决定, 参照该模式, 在大学内兴办80~100个国家科学技术中心, 不断探索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伙伴关系新模式。

二、英国模式

1. 联合教授

1982年, 索尔福德大学与一些大企业共同设立“联合教授”席位, 这不失为大学与工业界合作中名副其实的一种创新。联合教授在行政上向大学和有关公司双方负责, 其薪俸及其他费用则根据用在各方的时间比例分由双方分担。例如, 索尔福德大学与英国煤气公司联合设置了煤气工程学教授职位, 与英国宇航公司联合设置了航空工程学教授职位, 与丹尼奇—塞克斯机器人学公司联合设置了高级制造系统教授职位, 与尤尼佛公司联合设置了胶体和表面化学教授职位。

2. 创业型大学

创业型大学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在传统的欧洲环境中做出了勇敢改革尝试, 较有魄力甚至敢做敢为, 积极寻求摆脱严密的政府控制和部门的标准化的创新型大学。这类大学不再一味维持传统的办学理念和实践, 而是敢于标新立异, 大胆承担转型的风险, 主动到市场中去冒险, 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组织特性上做出实质性的转变, 以便为将来取得更有前途的发展态势。这类大学力求成为“站得住脚”的大学, 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都表现出“创业”的特征。

首先, 它们具有强有力的驾驭核心, 比传统欧洲大学更能驾驭自己的改革步伐, 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其次, 它们拓宽了发展的外围, 比传统的系科更容易

跨越旧大学的边界，与校外的组织和群体联结起来，从事知识转化、工业联系、知识产权开发、继续教育、资金筹措以及校友事务。同时还便于以跨学科研究项目为重点，走出校门兴办研究中心，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际问题。第三，它们比非创业型大学更快地懂得从更多来源中获得经费，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拓宽收入来源的渠道，积极争取 IT 企业、地方政府、慈善基金会、知识产权的版税收入、校园服务的收入、学费以及校友集资，使学校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第四，它们努力激活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扎根最牢固的学术心脏地带，要求树立与新的管理观点相融合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第五，它们力求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创业型的大学文化。

对创业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这五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创业型大学的典范，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原是英国在二战之后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而建立起的“七姊妹大学”之一。沃里克大学于 1965 年建立在英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地带，距考文垂市中心约 3 公里，有 3 个校区，占地面积 720 英亩。由于在建校初期就遭遇了财政危机（1979 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政策，紧缩教育支出，并于 1981 实行了第一轮大量削减预算，在大学系统，三年内大约削减 17%，连建校仅 16 年的沃里克大学也被削减 10%。），刺激了沃里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过程，决定要自己筹集办学经费，不依赖政府，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首任副校长杰克·巴特沃思（1965~1985 年在任）积极主张发展学术，加强与工业界和当地社区的联系，致力于建立具有企业精神的研究型大学，把追求学术卓越与“创收”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尽管这种发展模式被一些保守人士指责为“商业大学”、“沃克里大学有限公司”，但沃克里大学仍然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先后建立起为企业和社区有偿服务的商学院（1967）、艺术中心（1974）、沃里克制造业集团（1980）、沃里克大学科学园有限公司（1994）等实体机构，密切了与商业界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展服务范围，使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沃里克大学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并为其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科技和商业管理人才，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研能力、一流的师资队伍使沃里克大学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和世界知名的创业型大学。这种将企业家精神融入办学思想的“沃里克模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3. 教学公司

为促进业界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强学界面向生产实践主战场开展科研和教学的积极性，英政府的科学和工程委员会（SERC）、贸易和工业局、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以及北爱尔兰经济发展局联合资助研究基金会于 1975 年组建了全国性的教学公司（Teaching Company Scheme）。教学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参加的科技协作项目，使高校和企业界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合作渠道。教学公司项目常由三方组成，即大学、企业和项目经理，项目理由负责该项目的大学选聘，在项目运作期间，其人事关系既不隶属高校也不隶属企业，薪酬由教学公司发放。教学公司的项目立项须由大学和企业一起申请才能有效，而且这些项目须来源于生产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项目一旦获准便可得到教学公司基金的资助，强度一般为项目所需的 50~70%。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对教学公司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寻求与大学合作，或通过项目协调员来搜寻

伙伴。

教学公司凭借项目使大学和企业拧在一起，并借助项目协调员和工作例会制度有力地保证了合作项目顺利进行。到1996年止，教学公司已完成合作项目1000多项，仅1992年就达成443项，有83所高校参与其中，涉及经费5490万英镑，合作领域含化学与化工、机械与电子、土木与结构、纺织与塑胶、生物与医学、信息与通讯以及一些服务行业，提高了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还积极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使研究生在大学教师指导下，对企业、公司提出的生产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争取在学习期间出成果，并付诸实践，而企业则为研究生提供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经费资助。这样不仅能使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向企业转化，而且因参加教学公司项目的研究生毕业后就到相应的企业工作，还能使大学为企业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实用人才。英国高等院校的产值已超过110亿英镑，若把对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计算在内，则最终产值已达400亿英镑。正是学界和业界的通力合作，使英国大学为业界增添了新的活力，对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模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日本模式

1. 共同研究中心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一些大学相继创建了“共同研究中心”，作为国立大学与产业界联系合作的窗口，将国立大学的研究能力和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结合起来，创造出优秀的研发成果。共同研究中心除了与民间企业开展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外，还为企业技术人员提供研修机会和技术咨询。与此同时，共同研究所产生的发明及专利为国立大学和企业共有。包括共同申请的专利在内，凡与此共同研究有关的国家专利，合作企业可在一定期限内优先使用。迄今为止，日本全国43个都道府县中已有52所国立大学设立了共同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日本对私立大学也给予了一些支持，如通过共同研究推进中心资助私立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在税收上对国立大学获得企业法人和个人捐赠给予减免优惠等。

2. 委托研究和委托研究员

委托研究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委托国立大学进行某项研究的制度。接受委托的国立大学使用政府拨款或企业赞助开展研究，面向产业需要提供科研成果，并协助推动民间企业的研创开发。该制度下所取得的专利虽然作为国家专利，但委托者可在一定期限内优先使用。同时，据《日本研究交流促进法》相关规定，可在国家所有部分不低于1/2的范围内转让给委托者。

但日本现行产学合作制度规定，企业委托国立大学教授进行研究只能签约1年，如研究项目需进行2年以上，则每年须重新签约；企业的委托研究资金每年上缴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学教授如申请有关奖金，必须每年向文部省提交详细的预算报告。有关经费使用若有剩余，需转入下一年使用时，必须经过一整套繁琐的手续。企业委托研究经费剩余部分被国家或地方政府收缴的情况也很多。因此，许多日本企业对委托研究敬而远之。对现行的委托研究制度，大学和企业双方都颇有意见，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有的公司明确表示，如现行制度不进行改革，委托欧美大学进行研究的情况将会继续。于是，通产省推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将企业委托大学的研究经费作为企业向大学捐赠的奖学金处理；大学使用捐款时根

据有关财政法特例规定，不需向文部省请示，可由校长审定；但为防止经费滥用，须建立严格的会计监查制度。据报道，日本企业通过委托研究等渠道向大学提供的经费每年为700亿日元，约占大学研究经费总数的2.4%。

委托研究员是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到国立大学及大学共同研究机构，接受研究生水平的研究指导，以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的一种制度。提高企业技术人员的研究素质和研究能力，使其能在企业未来的研发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对比与启示

以上所介绍的绝非美、英、日三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模式的全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出一些共性特征：

组织创新。企业孵化器、创业型大学、共同研究中心等都是一类组织创新。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单位，通过组织的创新，社会可以适应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和需求，如在我们的例子中承载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促进研发的社会价值的发挥。

人才交流。来自不同机构的从业者汇聚在一起，为完成某个研究任务共同努力。这是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必由途径，知识社会中，人力资源作为知识、技术和经验的载体，在沟通和交流中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更在一次次的知识生产实践中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

动态开放。不管是孵化器、合作研究中心还是教学公司等，其以项目为中心的组织管理方式都体现了一种动态性和开放性——公司成熟即可独立运作，项目完成，团队即告解散，同时，不断有新的项目进入，参与资源的分享，很少有体制性的壁垒造成体系的僵化。

松散联结。三国的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都是由众多机构组成的一个大型的、松散联结的网络。网络内部的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组织结构中的等级关系，它们之间没有支配与依附，所有行为主体都以平等的身份与地位参与结网。政府主要是推动制度的供给，大学主要是强调其科技孵化功能，企业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知识和人才配置效率的提高。

共生共赢。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合作与竞争中是共生共赢的。具体来讲，系统成员通过功能耦合共同发展各自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技术水平、营销水平等。政府实现了国家层面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大学提升了教学科研水平；企业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且，这种提升是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的。

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我们也可明显看出美、英、日三国的不同：美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提供制度平台，同时市场力量强大，企业孵化器等中介机构有较充分的发展空间；英国大学迫于财政压力反而解脱了传统的束缚，释放了更强大的创新活力，更充分地体现了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新特征；在日本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关系中，政府主导的色彩更浓厚，大学和企业的活力不及英美，政府在催生新事物的同时又不免对其束手束脚。

我国不断构建和完善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应该充分研究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模式，有机地吸纳和转变为中国特色的实践。尤其是在我国

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应该注意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关系的构建中,优化市场价值和信息传导环境,促进各主体间的有效联结。具体来讲,大学、政府和企业各方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立政策支撑体系,营造创新环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主体;促使创业成为大学的第四项使命;强化中介组织的联动集成,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建立并完善合作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创新投入体系;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培养创新精神,塑造共赢文化。⁸

合作打造法国教育“品牌”——《菲利普报告》解读

摘要: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国传统的综合大学、大大学校与研究中心三足鼎立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受法国高教与研究部委派,克里斯蒂安·菲利普教授带领专家小组就大学和大学校相互合作的新途径以及如何共同打造“法国”国际教育品牌等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并提交报告。本文将着重介绍这项报告的背景、内容及意义,解析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及策略。

关键词:法国,高等教育,大学,大大学校

2008年11月7日,菲利普及其领导的“大学与大大学校新合作委员会”向部长提交了工作报告:《大学和大大学校还能建立哪些新的合作?》(以下简称《菲利普报告》)。报告详细地分析了法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才培养等特点,论证了大学和大大学校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应该进一步相互靠拢,就新的合作可能提出了建议,并特别强调在不触动法国高等教育二元体制的同时,由“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作为中间机构协调大学与大大学校的合作,共同打造“法国”的国际教育品牌,提高法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一、报告的背景

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综合大学、大大学校和科学研究院。三者各自独立,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各有特长和成就。但由于研究力量游离于大学体制之外(集中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系统之内),研究人员相对分散,造成了法国大学以及广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低,在世界高校排名中常常落后于美英等国。

早在1998年,法国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阿达利就曾经向当时的教育部长阿莱格尔提交了一份题为《构建欧洲高等教育模式》的报告(简称《阿达利报告》),该份报告在结尾部分建议通过建立3—5—8(指学士—硕士—博士在高中毕业后的修学年限)统一的高等教育层次,促进大学和大大学校之间的师生流动,并通过共同建立高等教育校园等方式促进两者相互靠近。随着教育全球化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2006年法国高教与研究部提出国家要有危

⁸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作者: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马永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王孙禺 刘帆)

机意识，决意着手改革高等教育。

2006年4月18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部关于《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规划法案》，决定设立“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PRES），通过这一组织推行改革，把法国各类公立或私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聚合在这一组织框架下合并业务、共享资源，建立一个更为协调一致的体系。2007年3月，法国政府以政令的形式正式批准了该机构的成立。同年8月，议会通过了《大学自治法》，其中也提到要平衡大学和大学校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的资源，促进两者合作。2008年6月，高教与研究部长贝克莱斯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为大学和大学校之间的“协同合作”寻求新的道路。她写信给克里斯蒂安·菲利普这位资深教育专家，委托他担任这一委员会的负责人。菲利普是里昂第三大学法律系教授、欧洲问题专家，2007年被法国总统萨科奇聘请为“法语国家共同体”的法国代表。委员会其他成员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专家及政府相关人员共20余名。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大学与大学校合作的新途径及合作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我们将解读该报告，并试图分析法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如何解决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主要改革建议

1. 从入学和人员上促进两种机构的靠近

在法国，学生只要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就可以上大学；而要想进入大学校则必须经过预科阶段的学习并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长久以来，那些成绩优异的高中生（除了准备学习医科或法律的学生）一般都会选择读预科班并通过选拔进入设施完善、教学水平优异的大学校就读，其专业性和实用性教育一直为社会所认可，毕业生通常都比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一份收入好、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也就是说，长久以来的这种入学时的分流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分层点。虽然政府试图通过将设有预科的高中搬到一些贫困的地区来吸引那些不富裕家庭的孩子念预科，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法国教育部的评估、预测和绩效司（DEPP）在2007年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状况》报告中指出，大约有30%的大学新生来自富裕家庭，而在大学校预科班这个数字则为49.2%。

一些教育观察家认为，高中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机构时往往是盲目的，既缺乏信息来源也没有专业的指导，但通常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和指导，他们比其他学生更能了解社会的需求，从而做出选择；另外，在一所设有预科的高中就读的学生和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时也会表现出不同倾向。

针对这一状况，《菲利普报告》提出高等教育入学是促进两种教育机构靠拢的关键。仅仅向高中生提供学校简介是不够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信息，大学、大学校和中等教育应互相合作，让学生了解每个专业的通过率和就业情况，同时鼓励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打破地区之间的生源差别。报告建议“由各个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PRES）承担向高中生提供教育信息的工作，大学和大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也可以志愿加入这项工作，最好还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由一名高校教师和一名经济领域代表共同领导，与高中保持密切接触”。

所谓促进教师的流动，并不是要求教师在承担所在学校课程之外再到另一所大学授课，而是建立在“签订合同，确定某些共同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的流动，

这样不仅不会增加高校教师的负担，还有利于高校之间科研项目的合作。《大学自治法》将人力资源管理权下放到大学，为这种人员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

2. 开辟合作新途径

虽然“博洛尼亚宣言”确立的欧洲统一的3—5—8（学士—硕士—博士）层次对于法国大学和大学校的靠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大学校预科班的方向划分从一开始就将法国高等教育引向双元道路使得不同培养模式之间的靠拢变得难以实现。但在现实中，除了部分预科生经过2~3年（有的学生甚至需要4年）的学习后成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校，中途放弃或考试失败的学生一般可以得到一份预科与大学之间的学历对等证明并转入综合大学学习。另外，大学校的入校考试开始放宽大门，目前预科班的学生在大学校新生中的比例仅为50%，其余的则主要来自综合大学大一、大二、甚至大三年级的学生。此外近年来大学校内部还出现了“直升系统”——比如化工学院联盟（CPI）和国家应用科学院（INSA），相当于预科阶段直接设在大学校，经过2年学习，不需要参加竞争性考试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工程师阶段。因此，《菲利普报告》建议“由综合大学来承担辅导学生参加大学校入学考试的任务”，或者干脆把预科班设在综合大学。

除此之外，该报告指出硕博研究生的培养应该成为两种体制合作的优先领域。目前法国已经出现一些大学和大学校联合培养硕士的项目，比如巴黎第八大学和巴黎高等商学院自2008年开设的两校硕士生互选课程。但到目前为止，“共同培养”的概念还仅限于两校之间的学分互认，《菲利普报告》认为可以把“共同培养”发展为两所学校共同授予学位。这一点上博士生培养则已先行一步：2006年8月，教育部的政府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允许两所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授予博士学位。但法国博士生培养存在两点突出问题：一是法国大学校的毕业生读博士的人数较少（或许是因为大学校教育本身指向社会服务而非学术，或许是其毕业生的就业出路好）；二是博士生培养缺乏高标准，针对国外高水平留学生的奖学金体系尚不完善。针对这两个问题，《菲利普报告》指出法国要发展创新社会，满足社会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学校的“精英”毕业生不读博士实为一种人才浪费。该报告建议要把博士阶段看作职业生涯的初期，“让博士生在3年学习中与企业建立联系，让企业认识到博士生的附加值”，鼓励更多的大学校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另外，关于培养标准、吸引外国留学生等问题的解决，则需要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PRES）的框架下聚集教育各方面人员共同商讨解决。

3. 合作打造“法国”教育品牌

早在1998年的《阿达利报告》中，法国就提出“让法国的精英更好地认识世界，世界的精英更好地认识法国”的口号。虽然在一段时期由于美国签证率的下降，欧洲吸引了大批留学生，但赴法学习的人数近年来并没有显著增加，据法国外交部统计数字，2007~2008学年留法学生有260596人，比上学年减少了0.9%。对此，《菲利普报告》提出高教机构要合作，共同打造法国的教育“品牌”，并对相关的4个问题做出了解答。

问题一，如何提升法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

2008年11月15日，法国《世界报》报道了欧盟委员会计划于2010年前出台一套新的大学排行标准的消息，很显然，欧盟国家试图改变本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上的落后状态。《菲利普报告》建议由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PRES）承担提升

法国大学国际竞争力的任务，由该中心确定一个其成员学校共同使用的名称，后者将在国际上统一使用这一“商标”，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公开出版物上除了表明自己所属单位之外还要印上这一“商标”，这种“醒目”的标志将有助于提高法国大学的国际声望。

问题二，如何才能吸引优秀的留学生来法学习？

该报告认为法国留学生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和新兴国家的优秀学生数量较少，而把外国留学生培养成其本国的决策者或未来的大学教职人员对于法国来说是一笔最好的投资。因此，应充分发挥法国在研究生培养上的优势吸引优质留学生。另外，“法国”教育品牌的成熟还依赖于引进世界最优秀的专家，后者的知名度可以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提升法国教育的吸引力。因此，政府需要改善国际交流环境，简化签证手续，让外国专家及其家人更容易地取得签证和居住证，并为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提供满意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问题三，什么战略有利于法国教育机构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菲利普报告》认为，仅仅依靠吸引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来法还不够，还应该把法国的教育机构“迁移”到其他国家，这种“迁移”可以通过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或直接在海外设立学校等方式来实现。该报告指出，近年来法国在抢占中国、印度、巴西及东欧市场的同时，对非洲市场的开发不足，特别是忽略了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因此建议法国大学和大学校可以在北非地区建更多的学校并通过高等教育与研究（PRES）成立专项基金资助有意愿发展国际合作的大学和大学校。

问题四，应该使用哪种语言教学？

高教机构的教学语言是影响一个国家的教育走向国际的重要元素之一，但《菲利普报告》中并没有提出把英语作为高校授课语言，相反地，该报告指出“法语体现了世界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法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标志”。该报告认为，外国留学生在完成大学预注册之后到达法国之前，可以参加本国的法语短期培训班，在法国学习的第1年则可以一边选修英语授课的课程一边学习法语，从第2年开始学习法语授课的课程。事实上，法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法语教学，1883年就成立了旨在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非营利性组织——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发展至今已遍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类机构为法国招收外国留学生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支持。《菲利普报告》围绕教学语言问题指出，大学和大学校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比如在同一个网站上共同开设对外法语课程，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商讨并达成一致以促进法语的推广、推进法国国际教育的发展。

4. 建立合作的机构

《菲利普报告》认为，大学和大学校之间的合作不能满足于在一些教育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这些机构之间达成了双方或者多方协议就可以建立真正合作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和研究部赋予我们的这样研究任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真正的合作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且责权明确的机构。

目前法国有几个机构都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起来的。2008年6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前任院长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就未来工程师教育发展提交一份

报告，建议模仿美国“工程师院”(engineering faculty)的模式建立法国的工程师教育执行管理委员会(collesium d'ingénierie)，目的是将法国各工程师大学校集中在一起，采用共同的评估方式、促进各单位之间的合作并将这种方式逐渐推广到其他学科。除此之外还有“前沿研究专题网”(RTRA)、“竞争极”等机构。《菲利普报告》认为，目前分散的机构所关注的领域有限，最能统揽全局的组织还是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PRES)(以下简称“中心”)。该报告建议在保证大学独立性的前提下，逐渐完善该中心的职能，比如由中心负责向高中生提供分科指导服务、高校的国际合作服务、负责教职工工资发放、信息系统维护、文化体育方面的基金管理以及面向学生的各项服务(如图书馆管理等)。当然，中心也可根据成员学校的要求提供其他服务。当中心成员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时，该报告提议采取欧盟“加强合作”的弹性运作方式，保证成员单位在不致使中心支离破碎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局部合作，其他成员则可以随时加入这种合作并增强合作的吸引力。

高教部长贝克莱斯非常重视该报告，认为该报告中的积极建议将有利于发展大学自治的同时促进大学与大学校之间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然而该报告却没有解决当初贝克莱斯决议成立研究委员会时强调的关于大学技术学院(IUT)和高级技师(BTS)的教育问题，另外，对是否需要设立统一的文凭等问题也没有给出意见。总之，《菲利普报告》为大学和大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宏观的方向，真正的合作和政策的出台还需要时间和实践。

三、启示

随着高教全球化发展，如何提高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成为各国教育改革面临的课题。《菲利普报告》在这个方面带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大学合作，以共同的“品牌”来面对国际市场

我国教育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不能只靠几所知名大学。事实上，近几年来，这几所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出现下滑的趋势。面对国际教育市场，我国应着重调整自己的教育资源，在赋予大学更多自治权的同时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面向全球推出“中国的”教育项目。我们也可以设想由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一品牌，机构内部的人员组成应当是多元化的，其职能绝非干涉或控制，而在于提供信息、及时灵敏地反映世界教育市场的需求；同时，该机构可以促成大学之间相互合作的教育项目，从而建立起全国的网络式服务，这将更有利于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的流动；另外，由机构出面解决大学面对世界市场可能遇到的国际纠纷也不会显得势单力薄。

第二，积极开拓国际教育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元素在世界上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标志，“中国教育”在国内发展的同时还应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这决不仅限于几所学校与国外的合作办学项目或少数学校在国外开培训班取得的成功。目前就地域来讲，我们首先应关注亚洲、东欧以及与我国有长期贸易往来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就人员交流来说，则要吸引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来华、鼓励青年教师出国参加短期培训；就发展策略而言，前期可以侧重于中医、汉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项目，逐步扩大学科领域。国际教育市场包括师生资源、科研项目、学术话语权等多种内容，在积极抢占国际教育市场方面，一个统一的机构框架或许比单个大学更具优势。

第三，注重中国本土文化教育

我国和法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其语言和文化都是本民族国家重要的身份象征，是世界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利普报告》提醒我们高等教育领域也应把语言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作为一项任务。

另外，《菲利普报告》中提到的教育海外“迁移”恐有文化殖民倾向，而我们只有坚守自己的本土文化阵营才能抵抗教育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重视博士生培养

清华大学前任校长王大中曾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反映在博士生的培养水平上”。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博士生的培养在于知识的发展，目的之一就是培养研究人员或大学教师。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一个高素质研发人员的知识准备时间越来越长，社会对高新技术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博士生培养，特别是高级工程师的博士生培养必须与企业和社会联系起来。法国于2006年开始设立“博士校”，这是一种在科研项目基础之上的跨校跨专业的博士培养机构，它常由某所在该科研领域具有优势的大学牵头组建，研究课题常常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菲利普报告》中提议大学和大学校通力合作培养研究生，并强烈建议博士生与企业的联系，重视培养博士的执业能力。⁹

⁹《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刘敏）